

#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资料馆 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庸小说研究专家陈墨： 金庸是近两百年来最会讲故事的人



记者 李梦霞 程石冰 王哲能

金庸先生的小说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各个阶段,不同时期品读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体味,或澎湃激昂,或感慨满怀。近期,记者采访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庸小说研究专家陈墨,一起来看看在他眼中金庸先生的小说。

记者:您第一次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什么时候?最喜欢的小说是哪一部?

陈墨:第一次看到是在1985年,那是我大学毕业,要读研究生的前夕。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射雕英雄传》,看到草原的场景就被深深吸引了。当然,我虽然很喜欢《射雕英雄传》,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后面的旷世杰作,《天龙八部》和《鹿鼎记》。如果是最喜欢的武侠类小说,我会选择《天龙八部》,因为《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也是金庸真正的绝顶之作。

记者:金庸小说里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位?

陈墨:小说里面,我喜欢两个人物。因为我看武侠小说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武侠小说迷,一个是做文学评论的人。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迷,我最迷的可能是萧峰,就是《天龙八部》当中天生武勇的萧峰。那种豪迈,可能所有的男孩都会心驰神往。这是作为一个武侠小说迷,作为一个读者,我最喜欢的。

而作为做文学评论的人,那当然就会想的更多一点。萧峰这样武侠小说故事当中的人,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在武侠人物分析当中,第一喜欢的还是韦小宝这个角色。韦小宝到现在我还研究不清楚,我没有能力把他说清楚。

记者:您刚刚说《鹿鼎记》您觉得是他的绝顶之作,为什么能给这么高的评价?

陈墨:金庸是一个武侠小说家,但在《鹿鼎记》中写到反武侠的层次,就把武侠变成了“调侃武侠、幽默武侠”,然后把武侠的人物下降到作品的配角,还活得窝囊,死得更窝囊,就像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

《鹿鼎记》中金庸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对中国文化的深情是最基础的态度。深思是第二级的态度,更高一级是忧患,这是第三级的态度。然后最高的一级是幽默的态度。无可奈何也好,或者是喜剧结构也好,金庸把这四种,就是深情、深思、忧患和幽默混在一起。

《鹿鼎记》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小说,他对文化的态度,包含了戏谑、解构、幽默、讽刺,同时也包含了忧患、深思,包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思考、民族性的思考,包括历史文化对人的影响,也当然包含了深情,因为他挚爱他自己的文化。同时他也会愤怒,觉得他自己身上很多的缺点都是由文化而来。因为我们生活在文化的情境当中,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根据社会的文化剧本来做。

记者:您能谈一下金庸的爱国情怀吗?

陈墨:我们都低估了金庸的爱国情怀。大家都以为他仅仅做到深情这一点,就会忽略了深思。深思,就像鲁迅先生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爱国情怀。

金庸先生其实也是如此,他从少年的时候面临国破家亡的局面。由于日本侵略,自己不得不在外十年漂泊,一直担心自己的生命、担心自己的家人、担心自己的故乡、担心自己的国家。他走了大半辈子,走了全球,然后他再回望自己的祖国,回望自己的文化时,他的那种思想感情,都融在《鹿鼎记》这部书当中。要真正领会金庸的爱国情怀,就要认真地去读《鹿鼎记》。其实他很多幽默的地方背后都是眼泪,都是伤心,甚至都是愤怒,但是愤怒背后又都是深情,这种深情已经隐晦得非常深。

记者:有人说随着金庸先生年龄的变化,他的小说的风格也在不断地变化,包括里面的题材,您怎么看?

陈墨:我对他可能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读了他40年的书,然后一直研究了他35年。1989年我就开始发表长篇的论文,然后1990年就开始写书。

金庸跟一般的武侠小说家不太一样,跟我们概念中的通俗文学作家更不一样。举个例子,通俗文学作家就是找一个可口可乐配方,然后就生产成千上万桶,永远是一个口味的可口可乐。而金庸他虽然是可口可乐这一个生产级的,就是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武侠小说的写作者,但他是按照米其林的要求来写的武侠小说,也就是他必须每天的主菜都不一样,而且每天的配方都要大厨自己去创造。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意识地去实验不同的写法。

从第二部《碧血剑》开始,他就有了像《蝴蝶梦》那样的实验。这部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是两个不在场的人,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金蛇郎君,这两个人都死了。然后再通过袁承志和夏青青这两个年轻的一代人去不断地回溯他父辈的故事。其实这两个年轻人是一个“导游”,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层面,然后更高的层面是说他们爹的故事——一个江湖上的金蛇郎君,一个历史上的袁崇焕。这个实验就很超越武侠小说或者类型文学。

但是到了第三部他又变了,他又不按照老路子走了,他没有重复自己,他



陈墨。

不断地实验新的写法,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基本品质。你要是不断地生产可口可乐,那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到第四部像《雪山飞狐》,他又实验了两种写法。一种是有点像《一千零一夜》,或者是像日本的《罗生门》那样的,他的故事不是作者自己讲,而是让在座的所有人讲,然后每个人讲的版本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偏见来讲。所以故事的互相冲突,互相形成一个文本。

到晚年他更是这样,不仅是现实时空、历史时空、传奇时空,还增加了一个预言时空,《天龙八部》就是这样一个大预言。他的传奇空间,他的历史空间,他的人生成长空间我都能说清楚,因为他那个线索都是能找着证明。但是预言的空间,要找到证据来游览它、思索它的路径,确实需要考究一个读者的功力。所以他每一部书都不一样。等到《鹿鼎记》写完以后,他没有新招了,就不写了。

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当然他年龄的成熟也是另一个方面。随着年龄变化,他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也会变化。比如说他早期的《射雕英雄传》,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写的就是单纯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实这有一半是成长中的文化习得,而不是他独立思考的一个命题,或者一个主题。“写武侠的人都得要写爱国,都得写侠之大者”,梁羽生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模型和主题。

但当他年龄长了两岁,1959年时写《神雕侠侣》,写到杨过的时候,他就写现代人精神独立、情感独立,写现代人不会去向传统的礼教妥协,不会按照别人的眼光去雕塑自己的个性,不会按照别人的安排去过自己的人生,写现代人一定是要坚持自己的人生。对也好,错也好,就是自己坚持自己。

但写到晚年《天龙八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种澎湃热情全部都收敛到

自己的故事背后。这样对于《天龙八部》来说,他就纯粹是一个写故事的人。我刚才说了,他自己的愤怒悲哀,他自己都藏了很多层次,你只有走到最深处,才能发现金庸自己的感情层面。《鹿鼎记》也是,《鹿鼎记》的幽默,好像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说喜剧没心没肺那样的,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喜剧幽默背后、戏谑背后、结构背后,实际上是有他的愤怒悲哀和他自己的深情在里面。

记者:您认为金庸先生是怎么样一位前辈?

陈墨:他是两百年来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最伟大的讲故事的作家。

我刚才说了金庸他是突破武侠小说的通俗的天花板,然后升到了雅俗文学。他不断地实验新招,不断地创新自己的形式,而且不断地修订自己作品的一些错漏,都是突破了通俗的“俗而通雅,其可至真”的文化现象。所以我会说,他是我见到的最伟大的讲故事的人。

记者:您觉得未来金庸的小说会不会继续那么受欢迎。有人说先生去了,他的小说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力会下降?

陈墨: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考量,金庸的小说慢慢就像一个建筑,多么宏伟的建筑,慢慢都会被风沙所掩埋,这是必然的。他的十五部作品再过20年还在流传,再过50年可能有一部分大家不读了,然后再过100年可能只剩下两部旷世杰作,《天龙八部》和《鹿鼎记》,再过100年它将成为经典。

现在“时间经济”,就是大家的时间分配的精密度越来越高,能够看金庸的机会时间会越来越来少,这是正常现象。所以要理解人类的发展,从人类学、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小说的传播总是有自己的曲线,或者说就有自己的命运。